

火车票退票难 难在思维固化

□ 徐立凡

买票难,退票也难。如果原票丢失,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定,必须原价购买一张新票,并乘坐这趟列车,直至完成旅程后,才可持证明,将新买的车票退掉。有退票的乘客对此大为不解:既然是实名制购票,所有信息理应齐全,何以退票还如此“不近人情”?

从铁路部门的角度考量,退票制度设计得如此复杂和“功利”,一是可以堵住“黄牛党”凭一张身份证多次购票的寻租空间,二是减少大规模退票造成的运力浪费和利润流失。这样的出发点不能说错。“黄牛党”的空间越小,作为稀缺资源的春运车票就越容易达到尽可能的分配公平和价格稳定;在客运常年亏损的情况下,铁路部门也需要考虑盈亏问题。

不过,从乘客的角度考量,把退票搞得如此复杂,未免显得过于粗放。首先,乘客既已购票,就应视为与铁路部门的营运合同生效。除非特殊情况或特别约定,购票者理应拥有“后悔权”,有权利退票。这也是通常的行业惯例。

其次,收取退票手续费本身,已经体现了对于失误者违反合约的“惩处”,以及对新增管理成本的弥补。再用复杂程序“为难”退票者,多少折射出了行政管理的痕迹。

“狂妄的政协委员”让谁蒙羞

□ 魏英杰

近日,一个名为《狂妄的政协委员》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密云县政协委员李昕昉被曝向酒店员工爆粗口。事后,密云县政协召开紧急会议,撤销李昕昉密云县政协委员资格。

这个政协委员的资格被撤销,并不冤枉。视频中,李昕昉曾对酒店人员叫嚣:“我让你开就开,不让你开就不开,你信不信。”虽然他解释那是酒后失言,原因是酒店服务态度不好,但此举显然与政协委员的身份不符,背离了政协委员的素质要求。

政协委员的职能是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但民主监督本身并不是一种行政权力,针对的对象主要也是各级领导机关,而非一般的社会机构。退一步说,如果一家餐饮企业存在服务问题,也不该以这种方式进行“监督”。李昕昉这么做,实质上是利用自己的政协委员头衔,对企业进行威胁恐吓。这表明,李昕昉不仅混淆了政协委员的职能定位,而且还把这当作一种可以肆意而为的权力。

像李昕昉这种当了政协委员却还搞不懂身份职能的人,也非个别。现实中,认为当个政协委员就掌握了一定权力者有之;把政协委员当作绣花枕头者有之;还有的人则把政协委员当作一种荣誉奖赏,却忘了肩负的责任;更有人以为搞个政协委员当当,一旦违法犯罪便可拿来当作“挡罪牌”。或许正因存在这样的社会现象,李昕昉才敢于“酒后吐真言”,在公共场所撒泼逞强。

类似现象的出现,也与一些地方在邀请、推荐政协委员上程序不严谨,对政协委员的约束力不强密切相关。不难看到,公众对有些人何以能够成为政协委员感到不解,对一些政协委员的言行也感到困惑。如前阵子彭丹、周星驰等明星担任政协委员,闹得沸沸扬扬,就是一例。这并不是说明星不能担任政协委员,如果在政协开会期间又是迟到又是缺席,如何履行好政协委员的职能?

政协委员不是绣花枕头,当上政协委员更不等于戴上了“权力手套”。政协委员能否履行好职责,不仅关乎政协形象,而且涉及宪法规定的我国基本政治制度能否正常有效运作这一重大主题。因此,各地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切不可把推荐政协委员视如儿戏,而地方政协在推选政协委员时,也不可把这当作过场,更不可私相授受,把政协委员的头衔当作一种赏赐。

对于李昕昉一事,密云县政协的回应颇为及时。借此事件,希望今后在政协委员的产生程序上能够严格把关、找对人选,避免再次出现“政协委员酒店撒泼”这种让政协蒙羞的事件。

“9 个证”抬高讨薪门槛

□ 余宗明

讨千元工资,需办 9 个证;4 次反映情况,工作人员却来一句“4 次还嫌急,还有 20 多次的呢”……这是沈阳几位农民工的讨薪遭遇。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拖欠农民工工资,可有些被欠薪者仍频繁遭遇“弹簧门”。

集结在“讨薪难题”上的血与泪,俨然是世态的剪影。讨薪需办 9 种证,是讨薪难的又一个注脚。农民工讨薪,提供工资被拖欠的证据,或有必要,但要办 9 个证,委实太过繁琐。

有些农民工文化程度偏低,“劳动合同”“考勤卡”等,完全隔绝于他们艰涩的劳动语境;许多农民工的用人单位不规范,用人不签合同,解雇不依凭据……所以说,将办 9 种证作为立案前提,将举证责任推到农民工身上,实则铺就了讨薪路障。

再次,即使我们对抢票者的行为认定有违公平,但是,对其退票的“惩处”,也不应由其他没有“占票”的合情退票者分担。由于每个乘客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原因退票,因此,这种不合理惩处的普遍实施,实际上只是降低了营运者的管理成本,但却提高了所有乘客的成本。如果能把为退票付出的精力、时间都换作可量化的钱,就会发现这类似于强行加价。

那么,在春运的特殊国情以及铁路运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既能方便群众退票,又能防范住“黄牛党”或“占票族”不利用这一便利牟利或过多占有票源?

有人说,在方便退票的同时,应该规定春运期间一张身份证最多购买一次同一方向的火车票。通过限制性购票措施达到抑制占票冲动和“黄牛党”活动的目的。这是令人遗憾的想法,试想一下:哪种商品是通过限制需求来达到供需平衡的?

如果不把售票视为专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而是选择有市场品牌的企业分利合作,那么为了赢得售票业务,合作企业就会提高包括快捷退票在内的服务水平。此外,经过正当程序适当提高退票手续费用,同样可以起到抑制投机的冲动。

方便乘客退票,不存在技术障碍,怕的是思维不愿意突破。



公开就“离”

□ 文/毕晓哲 图/李宏宇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赵耀彤一直想公开自己的家庭财产,但妻子的阻挠却让其纠结。其妻所在机关福利优厚,而自己的做法等于把妻子单位往火上烤。赵耀彤觉得没法过道义这一关,妻子也对此放话出来,“你公开,就离婚”。

官员财产公开是无法阻挡的历史趋势,这一点早已达成共识,但对此有顾虑的官员妻子未必是少数,以“离婚”来要挟官员别公开财产的妻子也非个别。所以,需要正视的是:如何将官员妻子的“阻力”变成推动财产公开的“动力”? 变

春节人情要防“糖衣炮弹”

□ 涂洪长

自中央提出“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要求以来,各地官办会议和活动大操大办、大吃大喝等现象明显改观。眼下年关渐近,廉洁作风能否经受住新的考验,无疑是关系作风转变取得切实成效的又一道严肃考题。

“廉不廉,看过年”,这话着实简单而深刻。岁末年初历来是聚会活动、吃喝送请的高峰期,一些单位和个人常常借此慷公家之慨,由此滋生出“舌尖上的浪费”、“人情中的糖衣炮弹”等乱象,败坏着党和政府形象,也腐蚀着社会风气。近年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就不乏在节日期间大肆“张嘴”和“伸手”的丑恶面孔。

挡住年味包裹下的感情投资,扭转借年关过度消费的惯性,对于领导干部党性原则和品质作风是莫大的考验。刹住这股久遭诟病的吃喝风、浪费风和腐败风,对深入持久开展转作风活动,可谓意义重大。

国有煤矿被贱卖 不能党纪处分了事

□ 燕农

山西省忻州市纪检部门近期对“保德县价值 2 亿余元国有煤矿 37.5 万元卖掉”事件相关涉事人员作出了处理,给予时任矿长张明孩留党察看处分,其他两名责任人同样受到党内处分,另有两名责任人作书面检查。

2 亿余元国有资产 37.5 万元贱卖,真不知是慷慨呢还是无知?而对相关责任人竟然

“公开就离婚”为“不公开就离婚”呢?

可以说,制度性和法律性安排官员财产公开是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不仅有利于提升效率、避免“自下而上”方式的“中间停顿”或产生“反复”,也会真正打消官员的侥幸心理或顾虑心态。如果有关方面能看到民意和公众吁求,早日落实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来自于妻子的阻力也将不复存在。

财产公开制度会力挺大量的想公开却有顾虑的官员主动公开。相信当官员公开财产成为一种义务和法律责任的时候、“不公开”就要追责或当不了官的时候,一些官员妻子的抱怨和不满、甚至是“公开就离婚”的要挟就不会存在了。真到了那个时间,也许官员妻子反而会以“离婚”为由来督促官员们财产尽快公开了。

一段时间以来,各地酒局少了、会议短了、迎来送往的负担轻了,作风转变显而易见,备受社会肯定。不过,就在中央三令五申、领导同志率先垂范的背景下,近来仍有一些地方曝出三公消费挥霍浪费的丑闻。为逃避监督将公款吃喝的“战场”从酒楼转向私密场所,或以个人名义订台来掩盖公款挥霍,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甚至对曝光的负面典型报以同情态度。如此种种,都表明转作风绝非易事,在这样的重要节点更得经受考验。

转作风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重在持之以恒,不能囿于一时一地,也要重视防微杜渐,不能容忍以各种借口搞变通、打折扣,切不可让节庆、年关等成为放宽要求的特例,并为此而疏忽和懈怠。

法纪有约束,公众有关切,期待纪检监察、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形成合力,使官场廉洁风气能够经受住“年终考”,更使廉洁自律、厉行节俭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

只给予党内处分、留党察看,如此轻描淡写,更不知道是宽容呢,还是纵容?这或是近年来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的内因之一。

物权法明确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违反国有资产管理规定,造成国有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保德县国有煤矿资产严重“缩水”的背后,有没有合谋私分或者利益输送,需要彻查。就此,忻州市纪检部门没有权力草草结案。